

前言

俗話說「三個臭皮匠，勝過一個諸葛亮」，即便我們凡夫俗子沒有如孔明般的才智與謀略，然而只要同心協力、集思廣益，也能有機會提出比《三國演義》中所描寫的絕世天才還要更好的點子。

然而，您是否知道這句話在日文中有一個類似表達方式呢？看到本期的專題內容，想必已經有讀者猜出一定跟文殊菩薩脫不了關係。

沒錯，「三個臭皮匠，勝過一個諸葛亮」在日文中的講法，便是「三人寄れば文殊の知恵」——若結合三人的力量，也能有匹敵文殊的智慧。

相對於中文典故，帶出了古代歷史上的知名人物，日本人則選擇以文殊菩薩，作為諺語中象徵智慧高超的代表，由此也可觀察到文殊菩薩在日本膾炙人心的程度。甚至每逢考季，許多考生或是擔憂孩子成績的父母，亦會前往供奉文殊菩薩的各地寺院，虔心祈求能夠金榜題名，就如同台灣人祭拜文昌帝君一般。

除了為考試祈福，文殊菩薩在日本更與幫助貧病民眾等社會救濟事業息息相關。

究竟文殊信仰在日本是如何發達起來的？本文將簡介在日本



深入日本社會文化的文殊信仰

所流傳的文殊信仰故事，希望讀者對於不同地區的文殊信仰，能有更多的理解。

據《續日本紀》記載，聖武天皇（724～749在位）於天平十三年（741）發布了建立國分寺的詔書，下令於日本全國各地，創立官營的公寺，並每月舉行誦經及誦戒等佛事。

其後，聖武天皇開啟了一個更大膽的計劃——傾國家之財力，要來建設一尊大佛。這個計劃最終的成果，便是目前坐鎮於當時設立的總國分寺——奈良·東大寺的盧舍那大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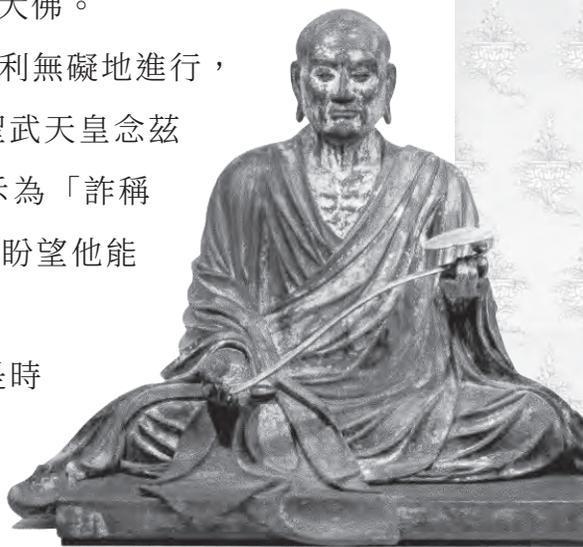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在建造大佛的過程中，並非一切順利無礙地進行，只憑官府的財力與物力，根本無法完成這項聖武天皇念茲在茲的任務。為此，他決定向一位曾被官府斥為「詐稱聖道，妖惑百姓」（《續日本紀》卷七）的人合作，盼望他能伸出援手。

聖武天皇這根不得不抓的救命稻草，就是時人尊稱為「菩薩」的行基法師（668～749）。

出身於河內國（相當於今大阪府東部）的他，青年時代即得度出家，其後更向曾入玄



東大寺盧舍那大佛



手持如意象徵文殊菩薩轉世的行基法師像

奘法師門下的道昭（629~700）學習，因此行基可以說是玄奘法師的再傳弟子。看似走向官僧的順遂道路，他卻在中年時選擇了180度相反的人生。

離開了官方佛教體制的行基，開始在民間傳揚佛教，並以「知識結」這樣一種僧俗混合的團體形式，以近畿地方為中心，從事救濟貧民、治水灌溉及搭建橋樑等社會公共事業。

然而當時在國家法令中，有一部管制僧人活動內容及範圍的〈僧尼令〉，其中禁止僧人恣意在寺院外活動和宣傳佛法。因此，行基的活動便被官府視為眼中釘，深怕他聚眾行善的背後，有著不可告人的「反政府」陰謀。

雖然長期受到官府的壓制，但他的團隊所累積的工程技術能力，以及動員民眾的巨大能量，卻為此



家原寺供奉的智慧文殊菩薩



供奉文殊菩薩的家原寺本堂大殿前掛滿祈求考試合格的白手絹

時的天皇所需，於是行基被任命負責「勸進」的工作，向社會大眾蒐集資源和募款。

最終，他甚至成為首位被賜予了僧官制頂點「大僧正位」者，也被尊為建立東大寺的「四聖」之一（其餘三人分別為功德主聖武天皇、大佛開眼供養儀式之指導者菩提僊那、東大寺開山住持良弁）。

而行基之所以被稱為「菩薩」，乃是因為相傳其乃文殊菩薩轉世。

根據《日本靈異記》中的一則故事記載，有位名為屋栖野古的高階官員忽然去世，然而屍體明明已沒有呼吸但卻散發著芬芳的香味，得知此事的推古天皇（592~628在位），下令為了紀念他對皇室的忠心耿耿，七日內不得移動他的屍體。

沒想到這位屋栖野古過了三日後便死而復生，向妻子訴說著他「死亡」期間不可思議的經歷：透過五色雲的指引，他來到了一座黃金山，更遇到了當時已薨逝的聖德太子。一同登上山頂的兩人，看見一位比丘樣貌的人，而在太子的指引下，屋栖野古吞服了仙藥，並禮拜比丘，口稱「南無妙德菩薩」。太子則告訴他，待「我悔過畢，還宮作佛」。沿著原路回來的屋栖野古，便從這場夢一般的經歷中甦醒。最終活到九十多歲才往生。

本書編者景戒在故事的最後，先讚賞了屋栖野古由於信敬三寶，而得死後復生。後面則分析其神秘經歷，認為妙德菩薩即文殊菩薩，黃金山就是五



12世紀檜木文殊菩薩像，為日本指定國寶，現藏於奈良興福寺

臺山；還宮作佛的太子，即是轉世為聖武天皇；而「爾時並住行基大德者」，乃「文殊師利菩薩反化也」。行基出生之處，後世也建為供奉文殊菩薩的家原寺。

二

文殊信仰在中國，早期是以《維摩詰經》為重心而興盛起來，經中文殊菩薩與維摩詰居士法論往來的情節，深深吸引了南朝貴族們的眼光，在玄學清談的風氣中，佔有一席之地。這樣的信仰型態，也透過壁畫或雕塑傳進日本，到了平安時代（794~1185）初期，以文章經國為理想的漢文學開始流行，此種貴族式的信仰也漸漸興盛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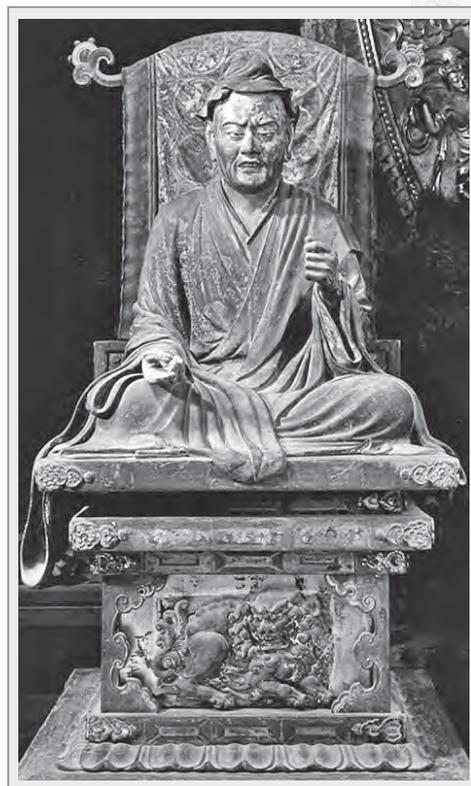
例如在菅原道真（845~903）的《菅家文章》中，就收錄有如下的漢詩：

山寺（廿頌十四）

古寺人蹤絕 僧房插白雲
門當秋水見 鐘逐曉風聞
老臘高僧積 深苔小道分
文珠何處在 歸路趁香薰

尋師不遇（四首第四）

尋訪文珠何處行 老松春色早鶯聲
自慙香火因緣盡 橋上徘徊斗藪情



12世紀檜木維摩詰像，為日本指定國寶，現藏於奈良興福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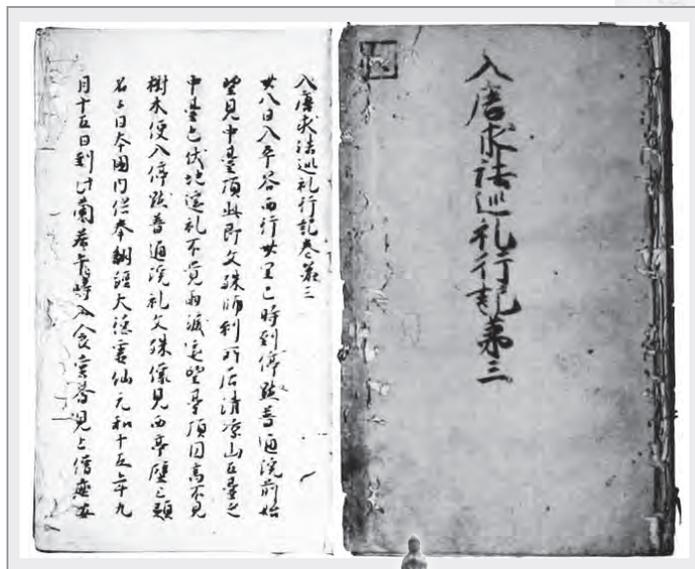
日本平安時代木造聖僧文殊菩薩坐像，現藏於教王護國寺（東寺）

詩中將文殊（殊）菩薩描寫為幽棲山中的得道高僧形象，則反映了當時貴族的文殊信仰型態，充滿了文人雅致的情調，但也讓菩薩利益眾生、智慧高超的面隱而不現，可以說是一種欣賞、審美式的信仰。

三

至於五臺山文殊信仰在日本的流傳，則可追溯至慈覺大師圓仁（794~864）。於承和五年（838）入唐的他，原先希望能參禮自宗祖庭天台山，卻因故未得官府允准，因此改變初衷，輾轉至長安及五臺山等地參訪，後因遭逢會昌法難而被迫暫時還俗，最終得以保全身命回國，成為比叡山延曆寺第三代座主，弘揚天台圓教及密法。

有緣巡禮五臺山的圓仁，想必對於當時安置於各堂的眾多文殊像留有深刻印象。根據他所著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的敘述，他首先在能望見中台的普通院禮拜文殊像，也觀察到食堂的入口安置了文殊像，更在菩薩堂院看見了栩栩如生的騎獅文殊像；他也記錄了眾多被視為文殊菩薩示現的祥瑞。因而回國後，圓仁於貞觀三年（861），在比叡山東塔地區造立



手抄本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



13世紀五台山文殊菩薩像，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

了文殊樓，在內安放文殊造像，成為天台宗文殊信仰的中心。

此外，在圓仁與第五代座主圓珍(814~891)兩人的努力之下，日本天台宗的密法教理與儀軌得以粲然大備。其中，圓仁也引入了有關文殊的密教修法——文殊八字

法。此法是以唐代菩提流志所譯之《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》為本，最早於嘉祥三年(850)時，曾由圓仁在當時的天皇寢殿仁壽殿舉行法會。此文殊八字法，雖多用於確保建物平安的鎮宅用途，但亦以具備除病延命、安產、禳除天災等功能，而為公卿貴族們所重視。

四

文殊信仰在日本，最為特別的是將其與社會救濟活動連



比叡山延曆寺文殊樓



13世紀八字文殊及八大童子像，日本MOA美術館收藏

結起來，其根據在於西晉·聶道真所翻譯的《佛說文殊師利般涅槃經》。經文中說：

「此文殊師利法王子，若有人念，若欲供養修福業者，即自化身，作貧窮孤獨苦惱眾生，至行者前。若有人念文殊師利者，當行慈心；行慈心者，即是得見文殊師利。」

若有修行人願供養文殊菩薩、培植福德者，文殊菩薩便會化身為貧窮孤獨苦惱的眾生，來到我們的面前，因此真能對此等眾生行慈心，盡己所能協助他們，就是得見文殊菩薩。

此經於奈良時代傳入日本，由此典故，在僧正勤操及元興寺的泰善兩位大德的申請下，太政官於平安時代初期的天長五年（828）二月下令，地方諸國須於每年七月八日舉行「文殊會」，在此法會中供養文殊菩薩，並



1203年造立高約7公尺的巨型渡海文殊像，為日本政府指定國寶，現藏於日本安倍文殊院

布施食物給貧困百姓。原先屬於私人性質的施食，到此則轉變為具備國家性質的法會。此會前後三日不但禁止殺生，更向集結而來的百姓們授予五戒，也教導他們稱誦文殊菩薩及藥師佛的名號，除了在經濟上的支援外，更盼望能藉此結下法緣。這般布施加上授戒的模式，也成為其後同類活動的基本型態。

以文殊信仰為根據的社會救濟活動，其後至十三世紀，由忍性法師（1217~1303）發揚光大。

近世以來的日本佛教，時常被揶揄為所謂的「葬式佛教」：佛教對於一般人的生活來說，只在需要喪葬服務時，才會尋求法師的服務。然而，若回到一千多年前的日本，會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狀況。

當時對於「死亡」這樣一種人生必經之路，受到神祇信仰的觀念影響，視其為污穢而不淨的災厄，甚至帶有傳染性，假若生者接觸或靠近，便會被認為沾染上了死亡的污穢，而須暫時與他人隔離，也不得從事某些宗教活動。加上在神佛交融的情況下，當時的大寺院多兼設有鎮守神社，並有官僧固定於神前誦經，所以也讓官僧普遍避諱著有關死亡的事。因此即便身為僧侶，若非名顯當世之輩，死後遭人遺棄於路旁乃至郊外亦為司空見慣之事。

既然僧人無法處理喪葬事項，那麼仍必須有其他人來承擔這樣的工作，



14世紀文殊菩薩騎獅像，
現藏於日本奈良般若寺

最終從事殯葬相關行業的人，如掘墓人、處理屍體的人，加上得了當時被視為業障病的漢生病（癲瘋病）患者等，這些被一般社會歧視並排擠的人們，形成了所謂的「非人」階層（以下為方便行文，仍採用此名詞，敬請見諒）。

對於這些普通僧侶避之唯恐不及的眾生，忍性及其師西大寺叡尊法師（1201~1290），卻投注了無比心力，以慈悲的胸懷全力幫助他們。

受到母親的影響，忍性自幼便對文殊菩薩信仰甚深，15歲時，順從母親的遺願，入額安寺出家為僧，並參禮日本三文殊之一的安倍文殊院（其他兩者為宮津的智恩寺與龜岡的大聖寺）。後於23歲時，他脫離官僧的身分，到奈良投入以重興戒律為志的叡尊門下，也將自身虔誠的文殊信仰帶入僧團中，開始了他傾注無比心力的救濟活動。

如上所述，救助非人的方式，以布施加上授戒為主，針對漢生病患者則是以當時的觀念與技術進行治療，此外也進行文殊菩薩的供養法會。

所謂布施，是提供飲食、金錢、日常生活用品或洗浴的服務。當時非人們由於受到歧視，因此多在奈良、京都的郊外邊緣形成自己的聚落，稱之為「宿」。忍性等人便是屢次前往不同的宿區進行布施，也不避諱與非



14世紀文殊菩薩像，典藏於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

人們接觸。這樣的行為，在被污穢觀念所束縛的人們看來，可以說是破天荒的舉動吧！

授戒部分，則以十戒中的九戒（除了手捉錢財外）及《梵網經》所說的十重四十八輕戒為主，盼望能藉此因緣，使非人走上成佛之路。

針對醫療方面，由於忍性曾參訪聖德太子所創設的大阪四天王寺，感佩於其所設置的施藥、療病、悲田、敬田四院，因而於其中年後的主要活動據點鎌倉極樂寺中，也設置了如施藥院、療病院、藥湯寮等的治療、福利設施。

由於此等難以想像的慈悲事蹟，時人也稱呼忍性為「醫王如來」、「生身如來」，可見得他的行動在當時所造成的深厚影響力。

結語

以上簡單敘述了文殊菩薩在日本的不同信仰型

態，如同第一則與第四則故事所示，文殊菩薩在日本，最特別的就是表現為與公共事務、社會救助等方面的深刻連結，這也說明了文殊菩薩的大智慧，乃是不離慈悲心的大智慧——悲智雙全，方能成就佛道！

參考資料

- 末木文美士等（編），辛如意（譯），《蓬勃發展的中世佛教——日本II》（新亞洲佛教史12）。台北：法鼓文化，2020年。
- 速水侑，《菩薩 由来と信仰の歴史》。東京：講談社，2019年。



鎌倉極樂寺山門